



三谈骂人

因为忽然想到一个“我要骂人”的题目，以补“枉担个虚名儿”之憾，又想起鲁迅有过一篇《我要骗人》，翻出来看，发现这位浙东乡先贤其实是虽有“骗人”之志，却无骗人的本领，通篇说的是真情与实情，毫不忌讳。尽管这篇应约为日本刊物写的文章，发表时文中“上海”、“死尸”、“俘虏”等词和指日本国旗的“太阳的圆圈”一语都被删去，还是看得出对“中日亲善”和国是世情的愤懑的。即如“中国的人民，是常用自己的血，去洗权力者的手，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”，这真是用血凝成的沉痛的经验，也是“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预感”吧。

鲁迅文中又说，“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，问我天国是否真有，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，答道真有的吧”，此时已是1936年2月，上距写《祝福》的1924年2月，整整一纪，祥林嫂关于死后是否有灵魂的提问，仍然萦绕于鲁迅的心。鲁迅以捐款一块钱，“骗”得了为水灾灾民募捐的天真孩子的欢喜，又深感为了不愿看失望的样子而骗她不应该的，因为鲁迅不相信信子会真的到灾民手里，“想写一封公开信，说明自己的本心，去消释误解，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，于是中止了”。鲁迅也终归不会骗人。

骗人：有些人是得心应手、心安理得的，但对只惯讲真话的人来说，就是个难题。

骂人，也不容易。

以子侄辈写前国民党将领们的史实的黄济人，在《三访黄维》中说到他请黄维过去原稿的情形：

“黄伯伯，我在纸头上骂你了……”

“骂我？你没有骂我。”黄维从一种漠然的情态中回过神，反而朝我笑了笑，“你写的事情是真的，就不叫骂。就算真骂了，也是活该骂的……”

读到这里，我不禁对黄维其人在这里表现的明达和气度油然产生几分敬意：在涉及个人的史实面前能持这样冷静的态度，不失为有识之士。

深圳、香港、上海、台北有个四城市文化论坛的组织，一年一会，至今已超过了10年。

这四个城市各有特色，可算是相当异质。有一年的会议主题是“城市的传统”，各城市就主题各提供一段纪录片。纪录片显示了各城市自我认知的差异。香港文化人有极高的国际化水准，但1997年后香港显然出现了认同危机。它的纪录片还有强烈的后现代犬儒风格。台北则是传统复杂，但近年来的台湾却少了鲜明的自我定位，遂只能将它的复杂传统对文化生活的影响，以平实的方式呈现；它很亲切宜人，但换个角度言，它在平实中却也有某种精神性的平庸之感。而至于上海，它成了中国的头号样板都市，遂难免多少有点自大浮夸。最独特的乃是深圳，它历史传统短浅，没有什么可以自吹自擂的成分，只能表现它很平常的生活方式，有小小的自傲，有平凡的上进。这个没什么传统的移民城市，因为没有传统的负担，反而轻松自在，步履也才走得更快。那次谈传统的会议，其他城市在那里侃侃而谈，深圳的朋友反而怯怯的有点过分的谦卑。我就指出，传统的重量有时反而是负担，深圳的幸运可能就是它少了许多有传统就会有的壮烈、悲怆、缅怀、做作与守旧。这反而使深圳多出了平淡、务实、上进的风格。

我近年读书，愈来愈有一种独特的认知。我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少数几个生长点，它不可能是中心城市，因为中心城市有太多力量会互相抵消；也不可能太过偏僻，各种力量都不足；一定要地点适宜，才可人文荟萃。我这个观念是来自近年读启蒙运动的启发。

近代人类最大的成就乃是启蒙运动、浪漫主义和工业革命。而带动这波发展的不是欧洲既有的那些中心都市，而是相当边陲后进的苏格兰。苏格兰在文艺复兴时还是极落后的地区，但从18世纪起却快速发展，成了带动变化的新中心。我的理解是：

第一，苏格兰人重视识字及阅读，并养成对知识充满好奇心的欲望。苏格兰的不同从阅读开始。

第二，我们研究苏格兰的启蒙，当可发现它那时的哲学、神学、文学都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那就是朴素。朴素是知识不离开常识，有一种经验的整体性特质。如果我们回头去读启蒙时代的主要著作，就会发现他们谈问题比较实在，没有东拉西扯的玄学腔，也不太会咬文嚼字，甚至那时的文学也很朴实。易言之，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格已符合了理性及科学的原理原则，没有虚骄的色彩。这种理性态度自然而然地符合了后来所谓的“现代性”。难怪启蒙时代令各类知识会快速发展，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了。

正因对理性启蒙那个时代极为尊崇，我对那个时代的朴素风格遂很喜欢。朴素是一种单纯，单纯地讲理，单纯地上进，正因单纯，才不会浮夸，也才会务实，也才会进步。中国若要进步，就必须发扬朴素的力量。我一向认为，将来的中国南方一定会在中国的发展上扮演重要角色，我对深圳即有这样的期待。

因此，当读到王京生这本《真理是朴素的》

为朴素拍个手

□ 南方朔

时，我的感觉其实是非常惊讶的。近年来，欧风美雨已影响到全体华人世界，人们写文章已出现一种新文艺腔，文辞华丽，文意闪烁，他们宣称是文化多元主义，其实却是用来掩饰他们的人生缺乏了热情、信念与努力的目标。美国当代主要思想家雅可比在他那本著作《乌托邦和近视症》里就举了好几个例子说，当今的人只会夸夸其谈，其实却连一篇可读的文章都写不出来。这种现象在中国亦然。而王京生的这本著作却没有那种晦涩的文艺腔，它抒情平顺，在平顺中自有块垒，那是一种朴素。真理之所以是朴素的，乃是因为人朴素，朴素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与质感，没有雕琢，自然实在，这种文章反而难写。王京生的文章虽短，但都有朴素的特性，而这也是当代及未来中国最需要的品质。

现在的人总有唯我主义的倾向，喜欢独白炫学，喜欢盯着别人抒议论，而少了相互的善意。而王京生的这本著作则有很深的相互善意，仿佛兄弟一起登山溪流，碰到困难的路，一定要相互扶持，互相打气叮咛。王京生很喜欢用时间作比喻，季节的变换，春夏秋冬，早晨傍晚，明天昨天，他的时间比喻都颇独特，没有伤春悲秋的伤感，而是笔锋一转，就转到了生命的方向。他的心是个转动的轮子，朝着清楚的方向前行。

因此，王京生的这本短文集，文章虽然都不长，但都有可以延伸的空间。我最喜欢的是《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步》这一篇，它虽是抒情式的说理，但也意图为深圳这个城市建构它的价值定位。今天这个世界许多人都会说，“要活出自己来”。这句话说来容易，但要活出什么样的自己却难，活出自己是要不从众，拒绝别人的赞赏，找一条别人不走的路，自我选择，自我负责，不怕这路多么难走，也要忍受孤单与误解，让以后的不同都由此而开始。王京生的这篇文章，在意境上，其实和美国诗人佛罗斯特的名诗《没有选择的那条路》可以互参。人生如行路，我们宁愿当个拓荒者，去走难走而没有别人走过的路，这也是王京生认为的深训精神，我也盼望这样的一种精神！

一个城市，筚路蓝缕一路走来。它过去可能很荒凉，但人的未来从不由过去所决定，一个城市亦然。一个城市是由活着的人的愿景所决定。深圳这个城市，由四面八方的新移民所组成，新移民乃是集体性格最独特且强韧的一种人。他们刻苦耐劳，愿意试探，他们是一本打开的空白书页，每个人都是集体作者中的一员。深圳在南方，有南方的机遇。深圳以阅读来自定位，而人们都知道，阅读乃是创造可能性的最大契机。

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关系，近两年来我都在鼓吹真善美这种启蒙的终极价值，而且做了好几次真善美的演说。中国近代最早讲真善美的是蔡元培，尔后有吴宓、胡先骕等人。真善美是一种对真理、公共之善以及综合美感的信念；真善美是一个整体，它会让人形成一种生命的原生性动力，“离开那个我们不应该在的地方”。那是进步与升华的泉源。

我以真善美为王京生的作品当注脚，也祝福深圳！

柔日读史(节选)

□邵燕祥

以黄维的简洁的定义相绳，要骂人，除了不讲道理以外，还须不顾事实。如此看来，骂人，也不容易。“我要骂人”，只好作罢。

本想把这个从想要骂人而又撤销原议的过程如实写出，也还是“吟罢低眉无写处”。好在前两年先后有过《骂与非骂》《颂和骂》两篇短文有所阐明，倒好像是一种“预感”了，然而一切预感也无非源于经验吧。

1989年9月3日

呜呼！冷漠、苟安与自欺

翻检故纸，抖落一页，抄着鲁迅《题未定草》中一段话：

徘徊于有生无灭之间的文人，对于人生，既惮扰攘，又怕离去，懒于求生，又不乐死，实又太极，寂绝又太空，疲倦得要休息，而休息又太凄凉，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。于是“曲终人不见”之外，如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或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之类，就往往为人所称道。

是一个年轻的朋友所抄，并说“那天您谈到‘隐居’的冷清，参照这些话，或可一笑”。日期署元月31日。不可能是前年，也不像今年，那么是1988年元月了。然当时怎么说“隐”来，已全忘却。

我倒想起周作人谈过：“中国的隐逸都是社会或政治的，他有一肚子理想，却看得社会浑浊，无可实施，便只安分去做个农工，不再来多管。”

周作人或是夫子自道吧，他从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营垒退出来，一来二去，终于“大隐于朝”了。他的血液中，原说是有叛徒精神和隐逸精神半参的，末了只剩下加入了引号的隐逸精神。

为什么加了引号呢？因为就周作人来说，他确实看透了“社会”的“浑浊”，这种唯我独清的心理导致除了自己以外对一切的彻骨的冷漠，而无能为力的心理又导致了置一切是非于度外的苟安。

最后使周作人“下海”的就是冷漠和苟安。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辱升沉中，暴露了许多精神上往往不能抗拒这种病态，虽然这病不是直接得之于周作人，也没有尽像周作人那样病人膏肓。

因此，研究周作人，看透他的病在冷漠和苟安，在今天也绝不是全无意义的。每当我自认为面对着各种“浑浊”的世相而又深受无力感的压迫时，常常冒出掉头不顾的念头，其实这种知识分子的心理病，也正是社会病的一部分，由社会病所造成，又助长了社会病，只是我们自以为明察秋毫地分析社会病的时候，往往忘记了还顾自身。从高谈阔论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”，到随波逐流，以至同流合污，正是这样日之就下的。以我们的苟安，指责周作人的“下海”，即使不是五十步笑百步，怕也是三十步笑百步吧。

苟安非久安。苟全性命于乱世也罢，苟全性命于治世也罢，在自欺中生存，复将在自欺中灭亡。

自欺，自慰、自在于苟安中，我们，自称中国知识分子者，将不会有更好的命运。

1989年12月1日

(摘自《柔日读史》，邵燕祥著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)

邵燕祥是个80多岁的老者，虽然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他，但这并不妨碍他照样是中国的一位知名的诗人、杂文家。耽误他被家喻户晓的，是他不善招摇的“毛病”。大众传媒上基本找不到他的影子，是因为他与今天的大学大致上也是互不需要的。就此，邵燕祥可算个很不与时俱进的人物。他在一部分人中的“很著名”，全是因为他的文字，而不是那种一本书就能卖上几十万册的文字，就此，他还是个生不逢时的人物。喜欢他文字的人，会认为他是个很牛很牛的人，没读过他文字的年轻人，干脆就不知他为何许人也。但是我觉得善思想、喜文学的年轻人若是不来认识一下邵燕祥，总还是难免有些遗憾。

邵先生跟我说他属于少量的老读者，让我别费这个精力再向年轻人介绍他了，他更没有“开拓图书市场”的雄心。然而我却不敢甘心那种会喜欢他却不认识他的年轻人与之擦肩而过。

我觉得，思想文化领域中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是不大会过时的；老头儿中的好老头儿也是应该被年轻人了解、记住的，况且好老头儿们骨子里也大都不会彻底老化的。

他们的老，往往表现在时尚方面和语境方面的不够时髦，其思想观念，往往比忙忙碌碌的年轻人和堂皇之中的中年学者们更年轻。这种年轻，是他们历尽一生磨难、几经涅槃后的“新”，是古树残株上面的新枝艳花。这绿叶红花，在遍体鳞伤、伟岸沧桑的枝干的映衬下，散发着来自灵魂的香气。远看，悦目神移；近前闻一闻，则令人的精神家园幽香弥漫。

老与少，自然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之别。前者，不可抗拒；后者，大可人为。就此，邵燕祥的好友张思之更为典型。玩笑间，我们甚至会出言不逊说他为老不“尊”。事实上这些老先生不但告诉了我们什么叫“赤子之心”，还让我立志将来也要活成个为老不“尊”的样子给这个世界看。我觉得，中国的古往今来，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，不管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，“尊”，都是个挺丑的姿态——像个阴森森的庙堂里会杀人的泥胎。

大概是10多年前，我才正式注意到邵燕祥。因为摄影家李晓斌(《上访者》的拍摄者)说邵燕祥是他心目中的“当代鲁迅”。我想这个“帽子”也太邪乎了吧！中国当代哪有什么鲁迅啊！然而这四字还是刺激了我，因为我很在乎鲁迅，又因为李晓斌是个“谁都看不上”的人。

张思之与邵燕祥这对老朋友，多年保持着激烈的“好人坏人之争”，以至张提到邵时，常常以“那个坏人”代替邵的名字。邵燕祥“搭桥”手术后的一次聚会，大家数落着身边的老哥们儿死的死、病的病，他们之中的“小字辈儿”郑仲兵蹙着眉头、不无一丝凄凉地感慨：“你们看，如今怎么总是好人得病啊！”邵燕祥则

低声细语、悠悠地说：哦？思之的身体不是很好吗？大家频频点头，都觉得郑仲兵的话有点绝对。不想张思之立即拍案相斥：“坏！真坏，你们看清谁是坏人了吧！”大家这才恍然大悟。原来邵燕祥这话是顺着郑仲兵的逻辑说的，意思是“张思之不得病，所以他不是好人”。后来的一段时间，我们就以“不得病的人”来称呼张思之，以此来暗示他是个坏人。其实这也正是邵燕祥的文风——总是骂人，却找不到一个脏字。事实上张思之和邵燕祥都是很坏很坏的人，只是坏的表现风格不同。张，锋芒毕露、拍案而起；邵，绵里藏针、不动声色。这种嚣张与温婉的差异，导致了不同阵营的人们很激烈地喜欢张或讨厌张，却较温和地喜欢邵或讨厌邵。

去年的一次聚会，我接退休教授钱理群。车在聊天，他说不再给年轻人讲课了，因为很多优秀年轻人不解事，若接受了自己的观点，担心会害了他们。到了饭桌上，邵燕祥又不约而同地发表了类似的观点：“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历史时期，会牺牲大量的人做铺路石的，就此他不忍心看到一些优秀的青年懵懵懂懂地做了这种铺路石。”年轻人尽管可以不了解、不喜欢这些老头儿，但他们却设身处地地惦记着年轻人。

又一次聚会上，大家提起邵燕祥很早以前发表于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的一篇短文曾从灵魂深处解剖了毛泽东的早年工作。

在日记本上我竟然找到了这一小片剪报，是1988年5月5日的报，题目是《评毛泽东的〈咏蛙〉诗》。没想到的是，20多年后我重读此文，竟与当年是完全不同的情感。

邵燕祥20年前就说过，“劫富济贫”是历来流氓无产者的口号。流氓有产者呢？他们的行动则是“劫贫济富”。与这个观点的深刻性相比，今天我更惊叹它的预见性。而短文《评毛泽东的〈咏蛙〉诗》，我今天才有能力读懂它的深刻性和预见性。邵在剖析毛的这首诗时写道：

……通观全诗，都与救国救民无关。诗中所透露的“抱负和志愿”，恰恰使人想到屡试不第后来领导农民起义的黄巢《咏菊》：“我花开来百花杀！”这是一种必欲凌驾群伦、唯我独尊的“抱负和志愿”。其诗格与黄巢、朱元璋相伯仲，不用说富于民主精华的古典诗歌优秀之作相比，即使使之于帝王诗之间，也远在刘邦《大风歌》之下，思想上、艺术上都不足取的。

此文完成后的一年就来到了1989年，而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《柔日读史》所收录的，便是邵老从这一年开始写作的“读史杂记”。我想，今天的年轻人若是外国的麦当劳、中国的麻辣烫吃得有点腻烦了，不妨回过头来品品邵燕祥惯制的这碗中国汤，说不定会有些“别有滋味在心头”的感觉。

至于邵燕祥这一时期具体的所思所想，有书在，就无需我多言了。

有人说，移民都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，深圳为每个灵魂提供了可以吟诵的舞台，我说，移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安定，为了安定，移民过去和现在都在默默地流淌汗水，安定下来的移民，刚刚流入的移民汇成的是一个愈来愈嘹亮的大合唱。

移民汇聚，像小溪入河；

移民涌动，像春潮破冰。

移民们含着泪水，又裹着志气，内心充满着焦灼、希冀，又步履镇定，时时感觉贫乏又时时充实，否定着又建设着，寻找着也获得着，思想着也行动着。

近看，是一个个或者热情、或者冷漠、或者彷徨、或者坚毅、或者精明、或者布满欲望的面孔，远看则是发育着的长满肌肉的大山。

移民，年轻的移民；蓬勃的充满不可遏止追求的困难的正在踩出道路的移民，向一切欣赏嘲弄困惑苟且的目光，作出无愧无悔的证明！

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

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。认识这一点使我们快乐。

蓓蕾将在明天怒放，风暴将在明天平息，雏鸟将在明天破壳，远行的人将在明天上路。就在明天，树木、群兽、海洋、土壤——天地万物完成了新的伟大释放和孕育，创造出无数的形态各异的生命。

不仅如此，随着残夜消退黎明来临，厄运成为转机，难题有了答案，沮丧让位于勇气，这是对明天抱有信心而在今天付出汗水的人终将得到的报偿。

很难想象一个对明天心存恐惧的人，能够在今天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。正是明天使我们之中的勇敢者面带微笑征服困境，身心俱疲而永不言悔，告别故乡而宁可选择动荡无助的生活，取得成功后又开始新的创造。有人曾经问福克纳：你为什么能够不断将烦恼抛却，那正是乐观地对待人生并取得巨大成就？回答是：“我永远直视明天！”

永远直视明天！人类不屈不挠的力量源于不断创造机遇的雄心和对明天的信赖，它使我们这个星球声音嘈杂而又生机勃勃，使追求与幸福永恒地交替出现。

感谢昨天的馈赠，正视今天的现实，但我们永远对明天无限关爱。生活不断地提醒着：沉湎过去只会悔恨或虚荣中煎熬；过分看重眼前，可能长久挣扎在名缰利锁之中；浩荡的永不回头的江河，笔直的不断向蓝天靠近的白杨，都启示着全力以赴奔向未来的精神。

每一个明天都是机遇，这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青春独有的宣言。它显示着血脉贲张的青春力量和把握未来的信心。它是勇敢者不断超越自我所表达的观点。怯懦的人，患得患失的人，暮气沉沉的人，哪来的此等人生之豪迈与意境。

于是我们理解了泰戈尔那美丽的诗的语言：“黎明，那是世界的希望；白昼，是世界的礼赞，每日开启东方金碧的门户。”

这就是明天的魅力，充满机遇的明天的昭示。

(《真理是朴素的》，王京生著，作家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)

真理是朴素的(节选)